

美国新经济周期与中美经贸关系

——全国美国经济学会第七届年会综述

全国美国经济学会秘书处*

由武汉大学商学院和湖北大学商学院承办、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协办的全国美国经济学会第七届年会于2003年9月19-21日在三峡大坝所在地湖北省宜昌市召开。来自外交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新华社、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辽宁大学、四川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吉林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江苏社会科学院、湖北社会科学院、四川社会科学院、上海上实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闽发证券公司、宏源证券公司、《美中经济评论》编辑部等40多个单位的从事美国经济研究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代表们向年会提交学术论文60多篇,交流专著5部,交流期刊6种。会议就美国新经济和周期、中美经贸关系以及人民币升值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提出了不少政策建议。现将会议内容综述如下。

一、美国新经济和周期问题

1. 关于美国新经济存亡问题

近年来,人们对于美国新经济是否存在、新经济是否是泡沫经济等问题存在争议。与会学者的基本观点是:

第一,美国新经济是一个客观事实。它确实不同于一般的经济繁荣,这是经历了结构性调整阵痛、新技术革命创造性破坏洗礼和对新兴产业大量投资之后出现的一种新局面。新经济的出现和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和扎实的基础,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也没有必要因为有IT泡沫、有公司丑闻、有经济周期而去否定新经济的存在。

第二,美国新经济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高新技术和现代金融为支撑、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生长出来的一个全新的经济形态。新经济的兴起有三大支柱: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技术创新是新经济的发动机;为其提供原始资本的风险投资是新经济的助推器;为其提供扩张资本的股票市场(特别是NASDAQ市场)是新经济的放大器。不仅是新经济的扩张,新经济的衰退也与此三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第三,新经济的未来生机无限。20世纪末美国新经济中网络泡沫破灭、网络公司倒闭意味着美国新经济第一个发展时期的结束和第二个发展时期的开始。

2. 美国新经济周期波动的性质与成因

美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后的逆转发生在2001年初,而其经济增长滑坡的趋势则可以追溯到2000年。自2001年3月开始,美国经济第9轮历史性经济扩张结束,经济衰退和新一轮经济周期开始。

关于此次美国经济波动的性质:一种观点认为这次波动是长波上升阶段中的一次波动;第二种观点认为是长波下降阶段的起点;第三种观点认为是1991年以来增长长期的结束,是短周期波动,可能是下一个长增长长期的开始。

关于此次波动的成因,一种解释认为:“新经济”不但无法消除经济周期波动,而且自身也需要进行结构性调整;股市泡沫破灭带来的负财富效应使过度消费骤然下挫到谷底;美国经济中潜伏着一直没有解决的危机因素;石油价格上涨对美国经济减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9·11事件”是促成美国经济进入全面衰退的重大变数。另一种解释认为:美国新经济周期波动的成因包括多种因素,但主要是技术因素和金融因素。就根本原因而言,主要是信息技术革命形成的创新浪潮对整体经济造成了全面的技术冲击;其次是以财富效应为主的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股市的波动传导了技术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加强了实体经济的波动。

3. 信息技术产业在美国新经济周期中的作用

(1)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为新经济周期的上升提供了原动力。信息技术产业投资的大幅度增长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长时间保持较高速度增长的重要原因;由于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强化了生产分工,形成了新生产门类和部门,提高了生产的可“迂回化”程度,从而不断创造出更多的新的就业机会;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改善了资源的配置方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2)信息技术产业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主导产业,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变化也已经成为美国新经济周期运行的主导力量,新经济周期的演变、调整和表现出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都直接和间接地与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 and 变动相关联。

(3)在新经济周期中,占主导地位的信息技术产业的波动幅度超过了其他产业的波动幅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比古典周期和战后的现代周期的波动幅度更大。因为新经济周期中制造业所占比重已经大大下降,而且由于信息的发达,经济会进行及时的调整,再加上国家适

* 齐绍洲、张澍执笔。

当的宏观政策调控,这些都会使得新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减小、波动强度减弱,其周期的谷底有可能只表现为增长率的下降而不是负增长。当然,由于进入新经济的时间太短、数据太少,新经济周期的这些特点尚需根据今后经济周期的实际进程做出正确的总结。

(4)有的学者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把美国20世纪90年代近10年经济的“超常规”增长归因于当时美国处于创新的高频阶段,即熊彼特所说的重大创新活动的集群。表现为:美国的技术创新——用专利申请数量说明技术创新活动的频率;美国的制度创新——建立新型企业制度和风险投资机制;美国的市场创新——大力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开辟新市场。2000年以后,美国经济增长减速意味着技术进步的周期性变化导致信息技术的重大创新活动基本结束,成本竞争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美国不具备成本优势,信息产业带给美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不断减弱,只有更新一轮的创新高潮才可能带来经济的另一个繁荣期。

4. 新经济条件下美国经济周期的演变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推动了美国微观经济运行机制、中观经济产业结构和宏观经济管理方式的深刻变革。在要素投入知识化、信息处理网络化、竞争方式创新化、生产制造柔性化和经营运作全球化等新经济条件下,美国经济的运行周期正逐渐显现出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经济的适度增长长期延长,经济衰退的冲击力减弱,经济衰退的幅度减小,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下降。经济周期受科技创新周期的影响更大,引起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将由固定资本的更新演变为主导技术的更替。经济运行的主周期——朱格拉周期将可能逐步演变为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相融合的趋势。

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强劲的高增长时期已经过去,在短期内不可能再高速发展,但也不会严重衰退,而是进入了低速增长时期。其原因是:(1)20世纪90年代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新经济,现在新经济的作用已经减弱;(2)美元的霸主地位受到欧元的冲击;(3)美国政治因素对美国的影响主要有:单边主义、反恐受到挑战、美国成为恐怖主义打击的主要目标,美国的安全正受到威胁、国际投资者正重新考虑是否将美国作为最后的避风港等,2002年外国在美国投资的大幅下降正是这一问题的反映。

5. 美国经济的复苏前景

有的与会专家认为:美国经济发展前景不会太坏,这次经济衰退表现出和以往不同的特点:生产的衰退幅度小,因为低利率带来的新的财富效应使消费需求还在增长,传统产业周期和新经济产业周期不一致。也有学者对美国前景相当乐观:(1)美国在衰退期对IT的投入仍没有减少;(2)美国90年代经济增长的动力(技术创新、金融创新和制度创新)并没有完全丧失;(3)美国微观企业仍具活力(2003年《商业周刊》评出的10大名牌中美国占9个,100家大名牌中美国占了65个,50个优秀企业中美国占了25个,500家大公司中美国占239家)。当然,美国经济发展中也存在三个不确定因素:失业率、减税政策和大选之后的政策走向。虽然影响美国经济复苏状况和趋势的因素好坏参半,整体上看美国宏观经济的基本面正转向积极,但2004年美国经济增长应该是“温和”而非“强劲”。

有的学者提出:在研究美国经济的前景和后劲时,有3个方面值得重视:第一,美国教育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7%;第二,研究与开发的投资占美国GDP的2.8%(2000年),达2500多亿美元;第三,全球优秀人才到美国留学并留在美国,这些对美国经济的发展后劲有积极影响。

也有学者从21世纪初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对阿富汗、伊拉克国家政权的“重组”的形势出发,认为美国经济将迎来大发展时期。

最后,还有学者对伊拉克战争后的美国对外经济关系进行了分析:对伊战争的最直接影响是美欧政治合作出现裂痕,从而更多转向经济合作,更多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扩大势力范围;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演变为区域之间的竞争,美国政府将对其对外经济合作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对国际经济规则及非经济收益的考虑将成为美国今后更多考虑的因素。美国近两年对外发展战略的转变对全球经济带来三大影响:一是多边贸易及区域贸易合作由原来的并行互补转向替代;二是大国格局重新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三是小国的影响在逐步扩大,小国将更多地寻求市场进入的收益,充当未来区域经济合作的成员,墨西哥、新加坡就是成功的范例。

二、中美经贸关系

1. 中美经贸合作中的矛盾与矛盾中的合作

总的来说,与会学者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合作前景看好,但合作中的矛盾和冲突也是无法避免的。我们应该趋利避害,积极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朝良性方向发展,但也不能回避矛盾。有学者认为:中美两国经贸、政治和外交关系由于五T(Tiananmen Square, Taiwan, Tibet, Transfer of Technologies, Trade)问题的存在,决定了中美关系在矛盾中合作的长期性,决定了中美关系既不可能很好也不可能很坏。但是,无论中美之间发生多大的风波,中美经贸关系一直是向前发展的。目前,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美国进口的10.76%,成为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势头是好的。但是,我们必须对中美经贸关系中的问题与矛盾有清醒的认识。有学者认为,我们对待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履行承诺要有一个理性的评价,我们只当WTO的合格成员,并没有必要成为WTO的优秀成员。2003年,原以为中国加入WTO后会国门大开的美国朝野对中国逐渐地打开国门大失所望,从而对中国施加压力。对此,我们要趋利避害,沉着应对,要与发展中国家联合,推动、迫使发达国家修改有关反倾销和农产品等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款。

2. 关于中美贸易逆差问题

第一,贸易赤字历来是美国手中的一张牌,它在贸易逆差上做文章是想打开中国大门,扩大自己的出口。随着美国2003年下半年和2004年经济的复苏,这一问题将得到缓解。第二,要正确评价中美间的贸易逆差就必须了解两国间统计口径的不同。第三,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很多都是外商到中国投资后造成的贸易逆差转移,并且对美国的相关产业没有竞争压力,感受到竞争压力的主要是其衰落的产业。第四,美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是中美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布什上台后,美国对华技术出口控制趋于严厉,美公司对华技术出口申请获准率下降,对前政府的承诺出尔反尔,对华技术出口控制进一步向海外延伸。如果美国放松对华

技术出口限制,就可以有效地降低其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第五,中美贸易摩擦会长期存在,不可能消除。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注定外资到中国的投资会不断增长,贸易转移会继续不断,由此造成的贸易逆差转移也会继续存在。第六,美国经济状况、产业结构调整对中美贸易关系影响很大。第七,美国的政治斗争需要和选举周期等因素决定中美贸易关系时好时坏,并将长期存在。第八,中美双方大规模的贸易战不可能爆发,因为经济上外商的投资利益、政治上美国的反恐战争都需要中国的合作等。

3. 全球化背景中的中美关系

全球化趋势乃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使然,同时,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全球化体现着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打上了当时主要列强的国家印记,朝着“国家化”的异化也是规律性的现象。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新构建,核心问题仍然是“单极化”与“多极化”之争。在后冷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全球化已从多个方面异化成了“美国化”。中美关系应该放在这一大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来看,这一大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的实质就是美国人说了算。在这种情况下,决定了中国应该采取“把握大势,找准位置;立足周边,广交朋友;韬光养晦,潜心发展”的应对策略。

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自然过程,经济全球化既是资源全球配置的过程,也是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经济全球化的主体是跨国公司,有时跨国公司的主张与美国政府的政策并不一致,如何看待跨国公司与政府的关系,到底谁是美国政策的主体?这是牵涉到“双层博弈”的问题。我们对待跨国公司的态度应该是:“引狼入室、向狼学习、与狼共舞、超越群狼”。

4. 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因素

有的学者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认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将受以下4个因素的影响:第一,中美双方经济的互补性和互利性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广泛的基础;第二,中美间相互依赖关系并不平衡,造成对华贸易政策自由化问题在美国国内不能得到足够的重视;第三,中美产业间贸易具有强烈的收入分配效应;第四,美国国内存在一些敌视中国的政治集团。

三、人民币汇率问题

人民币升值问题是会议讨论的热门话题,与会的专家学者就这一问题见仁见智、各抒己见。

1.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及利弊分析

一些学者分析,外国舆论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是政府压低人民币汇率以不公平的贸易手段所获得的。因此,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是引发升值争议的焦点。也有学者认为某些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政治背景是实现对中国遏制战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还有学者认为:事实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国内,人民币汇率改革是个非常迫切而又两难的问题。所谓两难,一方面人民币面临国内、外升值的压力;另一方面,调整人民币汇率目前缺乏可操作性。

有的学者认为人民币汇率调整目前面临的不利因素包括:

第一,此时此刻调整人民币汇率非常困难。因为当面临

巨大升值压力和预期时进行汇率调整,很可能出现“超调”现象,这对宏观经济来说将是灾难性的后果。另外,2003年上半年我国的贸易顺差仅为45亿美元,资本顺差为303亿美元,而外汇储备却增加600多亿美元,这说明其中大量国际游资已经进入国内等待人民币升值进行投机。所以,我们一旦调整人民币汇率,国际游资会对我国金融、经济乃至社会形成巨大冲击。

第二,现阶段人民币升值会弱化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这一优势,影响我国扩大出口和吸引外资,进而影响国内扩大就业。一个国家货币兑换外币的汇率确定,应当从本国经济的实际出发,有利于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反之则会影响人民的生活。

第三,目前,我国的金融系统风险较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仍然很高,人民币此时升值并不稳妥。

第四,从我国对外贸易的结构来看:加工贸易虽然顺差而一般贸易却为逆差。从地区结构来看,顺差主要是对美国的顺差,对日本、韩国、俄罗斯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均为逆差。这样的贸易顺差结构也使人民币升值与否无法确定。

有的学者认为人民币升值的有利因素包括:

首先,国际收支顺差转化为外汇储备的过程就是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的过程。因为国际收支是中央银行无法控制的外生变量,当外汇储备成为基础货币供给的主渠道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就会非常被动。而我国3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将迫使基础货币的投放几乎完全由外汇占款形成,中央银行也几乎无法控制基础货币,通货膨胀的压力将随之而来。

其次,2003年前6个月商业银行新增6000多亿元的商业贷款,基本上用完了全年的贷款额度。中央银行不得不发行中央银行票据来对冲外汇储备,以收回基础货币,这样势必会提高利率。中央银行票据在短期内对经济的冲击尚不会太大,但长期内会扭曲货币供给信号,尤其是由于到期回购会对货币供给造成冲击。如果这样恶性发展下去,有可能导致“无通胀过热”,这比通货膨胀更加可怕。

最后,人民币本身确实有升值的内在要求。随着资本项目的开放,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使汇率并不能真正反映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上升,人民币也应该随之逐步升值。在外汇储备充足的条件下,在长期内人民币升值有六大战略上的好处:一是有利于进口战略资源的储备;二是有利于进口技术含量高的机床设备;三是有利于引进人才;四是有利于扩大国内需求;五是有利于国防建设;六是有利于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对外投资步伐。

2. 调整人民币汇率所面临的制度性问题

第一,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如果调整人民币汇率,究竟应该一次性升值到某个汇率水平还是应该逐步调整到位?上调的底线应该在那里?调整人民币的汇率水平是让市场决定还是让政府决定?这些问题涉及到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过于纠缠于汇率水平,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但是,目前我们正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如果均衡汇率是可以计算的话,那么均衡价格也可以计算,从而计划经济就应该有它存在的理由并且富有效率,但历史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因此,事先计算出均衡汇率而进行人为的调整,这是计划经济

行为而不是市场行为,无法反映汇率市场的供求关系,这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方向相背离。另一方面,由于目前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和预期,此时完全交给市场而实行浮动汇率就意味着升值,因此,目前人民币汇率完全市场化也不可取。

第二,强制性结售汇制度。如果国家通过采取各种措施,适当减少外汇供给,增加外汇需求,以减少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里就会提出另一个问题,即国际收支平衡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目标,能否作为调控的工具?从理论上讲,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壮大,人民币有升值趋势。但是,目前人民币汇率不是在中形成的,而是强制性结售汇制度形成的,是无条件的供给、有条件的需求。因此,取消强制性结售汇制度势在必行。

3. 政策建议

第一,短期内,必须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对来自国内外的升值压力必须灵活地顶住。稳定的人民币不仅可以阻止国内外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与预期,从而有利于引进外资,而且有利于把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进行的中国汇率并轨的改革继续深入进行下去。

第二,转变出口大于进口的重商主义的观念,扩大进口高新技术和稀缺要素。中国一直以来都过于强调出口,现在应当转变观念,应该将对外贸易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联系起来。过去那种耗费我国的不可再生资源、牺牲自然环境、以生态失衡为代价去换取外汇,然后又用这些外汇中的大部分去购买美国的国债的做法从长期来看是不可取的。

第三,改革强制性结售汇制度,适当放宽外汇管制。西方发达国家藏汇于民、藏汇于企业,我国的强制性结售汇制度使我国的外汇昭然于世,包袱均由政府背着,使我们陷于被动。所以,必须改革强制性结售汇制度。当前,人民币升值的内外压力和预期,使改革强制性结售汇制度的迫切性与必要性更为明显,也是到了非改不可的时期。着眼于制度改革要比讨论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更有意义。

第四,改变人民币汇率只盯住美元的单一联系汇率机制,实行与美元、欧元、日元三大货币一揽子汇率联系机制,确保人民币汇率稳定。

第五,鼓励中资企业对外投资,提高外汇使用效率。

第六,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是必要的,但一定要既有管理又有浮动,而不能只有管理而无浮动。

第七,中、长期内人民币汇率适度、逐步调整是必然的,应该提前做好有关准备。在人民币汇率适度、逐步升值的过程中,应减税并降低利率,严格控制短线资金进出,鼓励扩大长期资本的进入,取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放宽国内个人、企业的柜台自由交易等。

第八,要采取双均衡策略,即中西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内部与外部的对冲均衡。应该对不同地区实行区别政策;对沿海出口企业应减少出口退税,对中西部出口企业应增加出口退税的政策,使整个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Q)

(上接第109页)

World Bank. China: Environmental Strategy Pap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蔡宁:《论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及其模式》,载《中国环境管理》,1995(3)。

张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共生策略》,载《财经问题研究》,2001(5)。

郑易生:《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应相互融合》,载《经济研究参考》,2001(29)。

Orr, L., 1976. "Incentive for Innovation as the Basis for Effluent Charge Strateg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6, pp. 441 - 447.

Porter, M E., 1990.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Porter, M. E. and Van der Linde, C., 1995. "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 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 9, pp. 97 - 118.

Portney, P. R., 1994. "Does Environmental Policy Conflict with Economic Growth?" Resources, 115, pp. 21 - 23.

①Palmer, K., Oates, W. E. and Portney, P. R., 1995. "Tightening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The Benefit - cost or No - cost Paradigm."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 9, pp. 119 - 132.

②Jaffe, A. B., Peterson, S., Portney, P. and Stavins, R., 1995.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U. S. Manufacturing: What Does the Evidence Tell U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3, pp. 132 - 163.

③Simpson, D. R. and Bradford, III, R. L., 1996. "Taxing Variable Cos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s Industrial Polic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30, pp. 282 - 300.

Ulph, A., 1996.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When Governments and Producers Act Strategicall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30, pp. 265 - 281.

④Weitzman, M. L., 1974. "Prices vs. Quantities." Review Economics Study, 4, pp. 477 - 491.

⑤Kwerel, E., 1977. "To Tell the Tru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nd Optimal Pollution Control." Review Economics Study, 3, pp. 595 - 601.

⑥Benford, F. A., 1998. "On the Dynamics of the Regulation of Pollution: Incentive Compatible Regulation of A Persistent Pollutan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36, pp. 1 - 25.

⑦Newell, R. G. and Pizer, W. A., 1999. "Regulating Stock Externalities Under Uncertainty." RFF Discussion Paper 99 - 100 (Revised),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Washington DC.

Hel, M. and Karp, L., 2001. "Taxes and Quotas for A Stock Pollutant With Multiplicative Uncertaint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 pp. 91 - 114.

⑧Baldursson, F. M. and Von der Fehr N - H.M., 1999. "Prices Vs. Quantities: The Irrelevance of Irreversibility." Mimeo, January.

⑨Miledina, A. A. et al., 2003. "Dynamics Environmental Policy With Strategic Firms: Prices Versus Quantiti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45, pp. 356 - 376.

⑩Robert, D. M., 2002. "Technical Change, External Economies, and the Porter Hypothesi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43, pp. 158 - 168.

⑪⑭Fischer, C. Parry, I. W. H. and Pizer, W. A., 1999. "Instrument Choice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h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Endogenous." Discussion Paper,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Washington, DC.

Fischer, C., Parry, I. W. H. and Pizer, W. A., 2003. "Instrument Choice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h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Endogenou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45, pp. 523 - 545.

⑫Milliman, S. R. and Prince, R., 1989. "Firm Incentives to Promote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Pollution Contro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7, pp. 247 - 265.

⑬Jung, C. Krutilla, K. and Boyd, R., 1996. "Incentives for Advanced Pollution Abatement Technology at the Industry Level: An Evaluation of Policy Alternativ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30, pp. 95 - 111.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430074)

(责任编辑:N、S)